

张闻天与中国外交

萧扬◎著



学林出版社

张闻天与中国外交

萧扬◎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闻天与中国外交 / 萧扬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486 - 0420 - 4

I. ①张… II. ①萧…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5247 号



张闻天与中国外交

作 者—— 萧 扬

责任编辑—— 刘文祥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24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6 - 0420 - 4/K · 38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书中所有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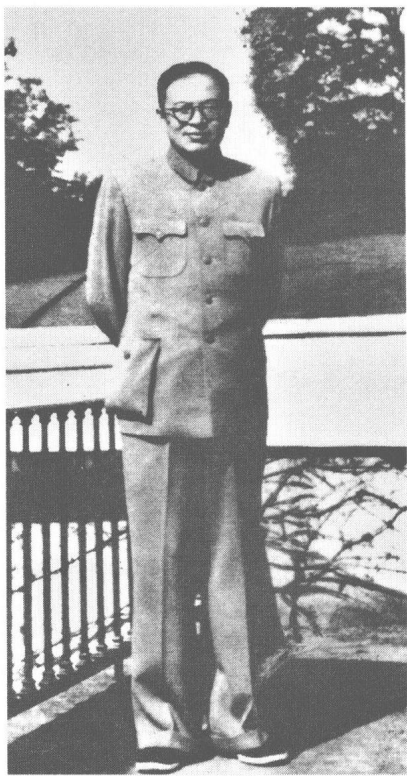
畢生勤奮，堅持真理，
平于律己，誨人不倦，是老
一輩革命家張聞天同志最
突出的優點，值得我們永
遠學習。

胡耀邦
一九五五年四月

开 头 的 话

张闻天,这个历史上长期蒙垢的人物,经过1979年平反后30多年中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其本来面貌逐渐得到恢复。人们知道他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并在一段时期内,对中共中央工作“负总的责任”,任内领导实现了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知道他坚持真理,在庐山会议上直言蒙冤,在“文革”流放的艰难条件下撰文批判“左”倾路线。这是一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导人,他的真实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重新显现:他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正确决策;他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善于团结干部,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他敢于担当,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不骄不馁,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办实事,讲实话。

但是,并不是张闻天的所有业绩都已经为人们了解或认同。例如,对于他在外交岗位上的作为,许多人就不甚了了。其实,他在外交岗位上工作了十年(准确地说,是九年六个月又二十七天^①)。这十年占他一生的七分之一强,占他从入党到逝世的全部革命生涯五十一年近五分之一,比起他所曾从事的任何其他工作(无论是在中央负总责,还是在中央的宣传教育部门领导工作,或在东北



外交家张闻天。

领导地方工作,甚或后来在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时间都要长,只比他“文革”被斗被流放的时间略短一些。在这十年中,张闻天所担任的是未曾到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驻苏联大使,以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由于工作的性质以及中央的有限授权,张闻天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他在外交岗位上对全局的影响,显然不如负责党中央工作的那些年。尽管如此,他在外交岗位上的十年仍是卓有建树的十年,是可资记述和应该记述的十年。他的外交政策建议和推行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努力,他对新中国外交机关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所作的贡献,他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业绩,以及他

在外交工作中展现的风格,都使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一个不能也不应避开的人物。

在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的十年中,我有九年在他领导下或直接在他身边工作。1951年张闻天出任驻苏联大使,我那时任职的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即归他领导。他的领导不是一般大首长式的原则领导,更不是甩手掌柜式的等于没有领导的领导。他曾亲临远离莫斯科数千公里的阿拉木图,住在领馆现场考察了一个星期。他没有要我们做正儿八经的汇报,但是平日接触中向我们提了许多关于当地情况的问题,其中不少是我们没有留意或知之不详的。结束考察之前他同领馆全体同志谈话,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对当地情况的调查研究上来。在他来领馆以前,我曾就苏联对哈萨克19世纪同俄国关系问题进行思想批判的情况整理过一个材料,由领馆报送使馆。那时没有电脑,领馆也没有打字

员,材料复写了25页,用纸很薄,字迹也不清晰。张闻天居然仔细看了,画了许多杠杠、钩钩,还作了批语,号召大家注意和研究苏联的动态,还给领馆发来电报,表扬这份材料。这次在领馆,他又对我说,这类材料有启发,类似工作还要继续做。

1953年11月,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因为业务量太少而撤销,我奉调莫斯科驻苏使馆,从此在张闻天直接领导的单位里工作和生活,同他有了更多接触。使馆的空气紧张而热烈,充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大家的情绪高昂而舒畅。张闻天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和处理日常对外工作的同时,对使馆的内部工作也抓得很紧。他同我们一起参加学习讨论会,一起打球跳舞,一起散步聊天,定期向全馆同志布置总结工作。我在研究室工作,研究题目的确定和研究报告的撰写都由研究室主任何方指导,但是每一篇报告都由张闻天修改审定。大家在使馆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见他的身影,都感到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团结、带领我们前进的一员。

1955年1月,张闻天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从那时起,我当了他的秘书。白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晚上,住在他的小院里。星期天,他常约外交部一些单位的负责人一同散步闲聊,我常随行。他主持的各种会议,常由我做记录。部内外各单位送他审批或传阅的文电,一般我先过一下手,对一些略欠成熟的文稿尽我所能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联系,也是我的经常任务。他到外地视察或开会,我也常随行。但是,像帮助起草或修改重要文稿一类高一级的秘书工作,则主要是由何方担负的。何方虽然职务先后是外交部办公厅的专员和副主任,却做了许多张闻天秘书性质的工作,堪称张闻天的得力助手。尽管如此,那些年我确实在张闻天“身边”工作,接触到他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了解他的思维习惯和方式,受到他的民主思想和作风的感染,而且对他自然而然地怀有一种崇敬而亲近的感情。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其实我对张闻天的了解是非常不够的。单说他个人的



历史,我当时几乎就毫无所知。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在遵义会议上同毛泽东站在一条战线、曾负责中央工作的经历,我都是到了1959年的批判会上才得知的。至于他在遵义会议上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会议决议等等,我一直到1979年中央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才从邓

小平的悼词中听说。张闻天从来不说自己的这段历史。长期以来,他的形象曾被扭曲,事迹被淹没,许多人也不清楚这些历史,即使有所知,也不会宣扬。我则同那时许多年轻同志一样,只是单纯地工作,没有打听他人身世和人际关系甚或进一步营造人脉的习惯和兴趣,不像官场中有的人之精于此道。

1959年4月26日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会议期间在华沙参观。左起:萧扬、方祖安、王国权、张闻天。右二徐达深。这是仅存的一张张闻天和我一同出现在画面上的照片。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从波兰方面征集的照片中偶然得来。

1959年的庐山会议,我随张闻天上了山,亲身感受了这场突然袭来的风暴,目睹了张闻天被抛进万丈深渊的残酷过程。我的同情完全在张闻天一边。在他经受斗争煎熬的漫长日子里,我只希望这样的日子快些过去,希望他能快些安全过关。几乎完全出于主动,我帮他起草了一份检讨,即他在庐山的第一份检讨。这份检讨的基调是承认对大跃进中的缺点估计过重。这样写反映那时我仍相信在看待大跃进的事情上,确实存在立场观点方法问题。

庐山会议以后,全国外事会议和外交部接连开会,继续批判张闻天。我无权参加外事会议,但是在外交部的批判会上却被要求揭发交代。我思想上并不认为张闻天、刘英反党,感情上更不愿同他们破裂。但是,在经过“教育”后,我相信自己需要改造,强令自己“端正立场”,改变认识,将张闻天许多正确、正当、正常的言行硬往反党的线上拉。我的“揭发批判”长期以来一直是我的沉重包袱。

1985年我在《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同志》一文的最后,写下了久已郁结于胸的一句话:“在二十年的漫长日子中,我曾对许多事实作过多次完全颠倒了性质的批判,这使我至今仍深感负疚。”

更加令我愧疚的是我的离开张闻天。张闻天本来希望我继续留在他身边,我却要求离开他,留在外交部。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为个人前途打算的私心。当运动中一些同志表示要同他划清界限时,张闻天曾说,现在船要沉了,都要溜了。这话也勾画出了我的灵魂。我向张闻天提了几次,内心也反复挣扎,但最后还是等到他同意,就交出我管理的文件柜的钥匙离开了。这使张闻天极度伤心和愤怒,他用从未有过的大嗓门怒吼:这是欺负人!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我还是外交部。不论如何,我在他落难时离他而去,加剧他的创痛,这始终是我感到最为愧对张闻天的心头之痛。关于我之调离张闻天秘书的岗位,还听到一种说法:张闻天要求外交部令我继续做他的秘书,上面则认为我是“张闻天的人”,必须调开,只同意另派秘书去。这一说法是否真有其事,我已无从知晓。不论如何,就我而言,离开他是我主动要求的,我一直深深负疚。

此后经过20年,张闻天在1979年获得平反。中央决定出版张闻天文集、传记,我有幸参加编辑工作,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主持日常的编务工作。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我同编辑工作小组里的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等同志一起,埋头于张闻天的史料,阅读他的著作。我仿佛重温了在他身边的日子,却又不断发现我不曾知晓的他业绩、品德的闪亮点。1985年《张闻天文集》出版以后,我不再担任编辑工作小组组长,却一直没有脱离张闻天研究。我参加了后来陆续出版的张闻天年谱、画册的一些工作,为此查看了有关档案材料。我关注国内张闻天研究的进展,并且不断从许多同志的研究成果中获得教益。1979年以来这30余年的工作以及工作中的再学习、再思考,使我一步复一步,日益走近张闻天。当年我在他身边如坐春风,直接的所见所闻让我感知了一个鲜活的张闻天。现在我进一步懂得了这个鲜活人物背后的历史和背景——他走过的光彩夺目而又跌宕起

伏的历史,他生活和工作的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错综复杂的背景,以及诸如此类许多单凭直接接触还无法了解的事情。不仅在当年我完全不了解的历史时期如此,就是在我日夜相随的他的外交工作时期也是如此。我看到,他在外交上确有许多清醒的独立见解(并非像我过去所认识的,他只是照直执行中央政策,似乎没有个人见地般与中央一致),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他也有那个时代共有的局限。基于这种新的认识,我对他有了更深更理性的尊敬。

在这本书里,我就想谈谈张闻天外交生涯中的一些事,当然是基于我个人的接触和感受,基于我现在的认识。

注释

- ① 张闻天的外交生涯,起于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外长照会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迄于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岗位。

目 录

开头的話.....	1
走上外交岗位	1
从未到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 / 资望有余,授权有限 / 个人志趣服从 调令 /	
外交不搞世界革命	11
中国外交的头十年 / 两条不同的外交路线 /	
在驻联合国代表团	24
朝鲜战争:如何对待参战、谈判和停战 / 联合国:争取加入还是闹成僵 局? / 早日同西方国家建交,还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	

在驻苏联大使馆 34

服务国内建设——驻苏联大使的工作主轴 / 驻外使馆的工作重心不是交
 际应酬 / 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前敌总指挥” / “答复请示制度” /
 信赖苏联外援,质疑苏联模式 / 狭隘民族主义的坚定批评者 / 涉及
 反对个人迷信的两件事 / 参加日内瓦会议 / 生气勃勃的使馆调研工
 作 / 那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 / 旧豪宅里的尚俭之风 /

在外交部：外交政策思想 82

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 “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 / 和平共处 vs
 输出革命 / 温和,理性,开放和国际合作 / 和平共处实践的成功总
 结 / 新的理论概括——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之一 / 对印尼的观察——
 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之二 / 争取长期和平共处不动摇——关于民族主义国
 家之三 / 在中苏裂痕初现时——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一 / 批评大国
 主义和骄傲情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二 / 既要团结合作,更要独立
 自主——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三 / 如何认识和对待南斯拉夫——关于社
 会主义国家之四 / 对美国:斗争中也要谋求缓和——关于西方国家之
 一 / 如何认识英美矛盾的两次争论——关于西方国家之二 / 对特殊中
 间地带的分析——关于西方国家之三 / 关于外交中的政治和技术 /

在外交部：内部工作 145

“改进”内部工作 / 与同志们相处 / 外交领域的理论研究 / 总的
 口号: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 主持肃反:纠“左” / “挂帅”反右:保护
 右派 / 加强对驻外使馆的领导和帮助 / 艰难的礼宾改革 / 节约和

清廉 / 最讨厌利用特权为亲属谋利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 188

以世界眼光研究外部世界 /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 研究工作的内行领
导者 / 抵御运动“左”的冲击 /

结尾的话..... 204

后记..... 210

走上外交岗位

张闻天担任的第一项外交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①。这是一项他从未到任履职的职务。他被任命此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联合国关系的走向尚未完全确定,存在着正常发展的可能性的短暂时期,而他始终没有到任,则是这种关系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结果。

从未到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

中国同联合国长期对立的这段历史,人们比较熟悉。在 1971 年以前的 22 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没有恢复,“联合国军”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联合国通过“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中国则视联合国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或美帝苏修的争霸工具。毛泽东多次表示进联合国还是慢一点好,他那时不屑于进联合国,甚至赞同印尼苏加诺的主张,即踢开现有的联合国,另组一个联合国。

但是,在 1950 年上半年,准确地说,在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前,中国

同联合国的关系则是不确定的,存在着另一种发展的可能。

当时在联合国起主导作用的美国曾经表现松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酝酿并最后决定从中国大陆“脱身”,在是否承认新中国、是否“保卫”台湾、如何处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问题上曾经犹豫观望,举棋不定。美国国务院一些人主张在适当时候承认新中国,条件是中国“遵守国际义务”和善待美国公民。1949年底和1950年初,美国确定继续反对新中国在安理会中取代国民党政权,但是不为此使用否决权,即使安理会中反对新中国的可能只占少数,它也准备听任多数决定。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声明,表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申明将台湾归还中国,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不拟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

接着,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试图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50年3月8日,他向安理会主席递交备忘录,主张如一个革命政府“在其本国领土内行使有效的权力,并惯常为大多数人民所服从”,那么即使联合国个别会员国拒绝承认其为合法政府,也应该给予该政府以在联合国中代表本国的权利。4、5月间,他到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莫斯科斡旋,建议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对于美国发出的信号,苏联迅速作出反应。在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不到两天,维辛斯基外长即于1月7日凌晨1时^②向当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提出,要中国向安理会提出要求开除国民党代表。1月13日,维辛斯基再访毛泽东,要中国即向安理会派出代表。1月17日,莫洛托夫又催促毛泽东说,此事“应尽可能快些”进行。苏联自己则除支持中国要求,还在安理会提出开除国民党代表的议案,并且声明在开除国民党代表之前苏联代表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毛泽东当时对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基本方针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就是要求在清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和影响以后再同它们建交,并不急于解决它们承认中国的问题。其基本精神当然也适用于处理同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联合

国的关系。本来,正像任何新建立的国家 and 通过革命成立的新政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要的外交任务,理应是取得国际承认,包括享有在国际组织中的应有权利,首先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国际上公认的大国标志,这对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影响有重要作用。因此争取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的合法地位理应是外交上的大事。但是中国当时所做的,只是以外长周恩来的名义,分别向联大主席和秘书长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取消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权利。此外在争取进入联合国方面就没有立即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

然而,当苏联表示要中国采取积极行动时,毛泽东还是表示“百分之百地赞成”^③。尽管他对联合国能起的作用以及中国任命驻安理会代表的意义并不看重^④,他还是立即布置任命我国驻联合国代表等工作。不过,对进入联合国的表现积极,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主要是苏联影响的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闻天被任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一职。

张闻天被任命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中央一些领导人对于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取代国民党的前景颇为乐观。刘少奇2月5日代表中央致电当时尚在辽东的张闻天,电中引用捷克大使的话说,大概三个星期内中国代表即可前往联合国。中央不仅催促张闻天迅速来京,而且由中央组织部急如星火地下令抽调一大批干部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在北京的三天内报到,在外地的五天内报到。

但是,时间过去不过五个月,朝鲜战争的炮火就改变了一切。张闻天就此注定成为从未到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

资望有余,授权有限

中国任命常驻联合国代表是应对当时局势的一项步骤,至于让张闻天担任这一职务,毛泽东则自有其考虑。

毛泽东最初考虑的人选是章汉夫。1950年1月13日和17日他先后向维辛斯基和莫洛托夫表示,章汉夫在美国学习过,是最合适的人选,唯一合适的人选。但是最后他还是把张闻天摆到了这一位置。毛泽东向刘少奇宣布这一决定时说,章汉夫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

其实,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出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而言,章汉夫的资望足够了,至少较之其他国家的代表毫不逊色。章汉夫担任过两广临时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工委副书记、港澳工委负责人,还担任过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即使以外交经历而言,他1945年曾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到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1949年担任过上海外事处处长,还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其他国家的驻联合国代表的资历鲜有出其右者。例如当时的苏联代表马立克,可以说没有什么党政领导工作经历(前苏联1950年的《外交辞典》中只用“1935年以前在乌克兰从事苏维埃和经济工作”一语带过),在外交领域虽然当过驻日本大使,最高官职也只是外交部副部长。

至于张闻天的资望,当然更是绰绰有余。为了突出张闻天的资历,毛泽东向刘少奇交代,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按照这一意见,新华社在1月20日发表周恩来外长就张闻天的任命致电罗慕洛、赖伊的新闻,同时发表《张闻天简历》,其中说:张闻天“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和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张闻天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1年以后,参加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在1934年冬至1935年冬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举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张闻天是这一长征的领导组织中的一员。1945年中共第七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然而新华社发表的简历,没有提到张闻天最重要的资历——曾在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以及由国内战争过渡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时期在中共中央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时期已经开始批评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的“左”